

中国 新闻事业 史稿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系统梳理了中国新闻事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全书共分五编，分别论述了古代新闻事业、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创新以及新闻事业的未来展望。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书。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推动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龙牧著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李龙牧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平岗
封面装帧 沈蓉男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李龙牧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1 字数 262,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200

书号 7074·284 定价 2.60元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	1
第一节	古代报纸	1
第二节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	9
第三节	难实现的办报愿望	18
第四节	报刊与维新变法运动	26
第五节	初期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35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报刊	44
第一节	革命报刊与《苏报》案	44
第二节	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	52
第三节	官报和民报	62
第四节	革命与新闻自由	71
第五节	从发展到幻灭	80
第三章	新民主与新型报刊	92
第一节	复苏与新机	92
第二节	百家争鸣中的新闻界	101
第三节	五四运动和革命报刊的发展	110
第四节	新型报刊的出现	120
第四章	新闻事业和大革命	132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创办	132
第二节	新闻事业和统一战线	142
第三节	五卅运动与新闻战线	152
第四节	鲁迅和报纸副刊	160

第五节	革命战争与革命报刊	170
第五章	十年内战中的新闻斗争	182
第一节	国民党的新闻统制	182
第二节	党的报刊与地下斗争	194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中的新闻事业	204
第四节	民主和法西斯的反复斗争	214
第五节	在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226
第六章	新闻事业在抗战中的发展	239
第一节	新时期的新闻战线	239
第二节	联合和斗争	251
第三节	敌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264
第四节	整风运动与新闻改革	274
第五节	争取民主中的新闻界	287
第七章	新闻事业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301
第一节	为了和平和民主的斗争	301
第二节	谈谈打打和新闻斗争	309
第三节	解放区的新闻战线	323
第四节	土改宣传和反客里空运动	332
第五节	人民争得了新闻自由	342
后记		358

第一章 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古代报纸

在现有各种新闻事业中，最早出现的是报纸。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应该从古代报刊的历史说起。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又是最早发明纸张和印刷术的国家，原始形态的、手写的报纸很久以前就产生了。原始形态的印刷报纸大体上可以断定曾连续出版达数百年之久，为世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所仅见。这曾是不少新闻事业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实物湮灭，历史记载不够详实，弄清古代报纸的具体情况已很不容易了。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以为“邸报”是我国古代报纸，它的出现可以上推到西汉时，即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其实，这是缺少充分根据的。“邸报”一辞的原意是指地方机关驻京都的办事处一类机构（“邸”）向地方机关传递中央诏令章奏以及宫廷大事的一种官方文书。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西汉时已有了这种“邸报”。不过，那只是一种官方的“报告”或“情报”，大约只供地方机关长官及其幕僚阅读，没有什么根据断定它已经发展成为某种超出官方文件范围的出版物，更不能给“邸报”二字加上书名号，说它已是一种报纸的名称。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古代事物具有近代的特征。古代报纸雏型不必具有近代发展了的报纸的

形态。但在没有进一步的材料说明那种“邸报”已经发展到不同于官方文书的程度之前，仅根据一个“报”字就断定那已是一种报纸，未必能说是科学的。

唐代已有某种古代报纸的雏型是可能的。晚唐人孙樵著《读开元杂报》，记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他曾在襄汉间看到过一种“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数十幅书”。他当时不知是什么东西，“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其实那只是误会，经“来自长安者”指明那不可能是当时的近事；并有“知书者”向他指出，所记“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以后，他“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等到他到了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算是完全证实那“数十幅书”确实不是当时的东西。这个故事记叙了唐开元、大中两朝中每日“条报朝廷事”的情况，看来，当时的长安已有人把朝廷“条报于外”的材料抄给需要的人，类似后来的“宫门抄”那样的事。这种手抄材料的详情虽然已不可考，不过这种东西既然已不同于官方机关的文件，把它当作某种手抄的古代报纸的雏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说中国古代报纸出现于一千二百多年以前，也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可以断定，这样的“报”在长安以外就连孙樵那样的出自高门华族的人也不大能看到。至于有人说“开元杂报”是世界最早的印刷报纸，那就更靠不住了。这一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出版之后，已有人指出过，^①新闻史家未加考究，袭用了想当然耳的说法，不能不说有粗疏之处。

到了宋代，有关情形有了比较详实一些的记载，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古代报纸那时有了初步的发展，是可信的。

这首先和进奏院制度的实行分不开。汉唐都是地方当局各自在首都设“邸”，以便“通奏报、待朝宿”的。盛唐之后，藩镇势

^① 见向达1928年著的《唐代刊书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

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剧了。唐代宗时曾把诸道设在京都的留后院统一为上都进奏院，以便加强中央的统一管理。但由于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终究有名无实。到了晚唐，藩镇跋扈不可收拾，中央集权就更加不能实现了。直到宋朝统一全国之后，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终于彻底实行了进奏院制度。从此原来的各州驻首都的进奏官，就由中央政府统一管了起来，受中央政府任命，并由皇帝的亲近之臣统辖，不再隶属于各自的州。这样的进奏院，已变得有些象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公文往来的总秘书处，中央集权制是大大加强了。进奏院发布一种“状报”，从唐代起就有了，那是要经过领导机关审定之后，才“报于四方”、并具有公文效力的。原来的“邸报”只是各地驻首都的办事处发给各自的地方官的报告、情报，现在的“状报”却是中央机关的通报，要“腾报天下”，这就和过去不同了。但它仍是一种官方文书，并不公开发行，和当代的政府公报也还有所不同。宋代雕版印刷术已经比较发达，活字板也已发明，但至今未见有关于印刷报纸的记载，大约和这种“状报”并不广泛发行分不开。说它是一种“手抄报纸”，还算勉强可以成立。

不过，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载中，也还有时提到“邸报”，而且显然是指一种和“状报”不同，而没有正式公文效力的东西。《宋史·刘奉世传》说，“状报”是要经过上级机关批准成为“定本”才能“报之四方”的。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到了南宋，这又被称为“小报”。《海陵集·论禁小报》中说：“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辈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由此可见，官方的“定本”“状报”和非法的私自传播的“小报”，其实都出之于进奏院；称为“邸报”，不过是习惯地使用过去的概念罢了。这种“小报”传播于“朝士”中和“州郡间”，但又确实并非官方文件，这

倒是较近于我们所说的报纸了。封建衙门总不免颀预。进奏院这样的统一的机关也不是没有空子可钻，非正式文本的先期传出，就适应了朝士和州郡大员们打探官场政治情报的需要。有了这种东西，有时就不免起一定的政治作用。北宋时就有御史奏事，“其章奏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的事，^①那显然有在士大夫中造舆论的意味。这种情况在政治斗争比较尖锐时就会十分引人注目。甚至发生过编造假的文件用“小报”形式传布的事件。南宋时关于禁“小报”的议论显著地多起来，清楚地说明它在当时的政治作用已使统治者感到不安了。

宋代以后，元朝关于这种报纸的记载很少，但入明以后，却明显地有了发展。几百年间这种报纸的性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什么时候变得发行较为广泛而具有某种出版物的特征，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可以断定，不迟于明代。自明末起，这种报纸又通称为“京报”，但“邸报”或“邸抄”这种名称也仍沿用着。这时，报纸的规模已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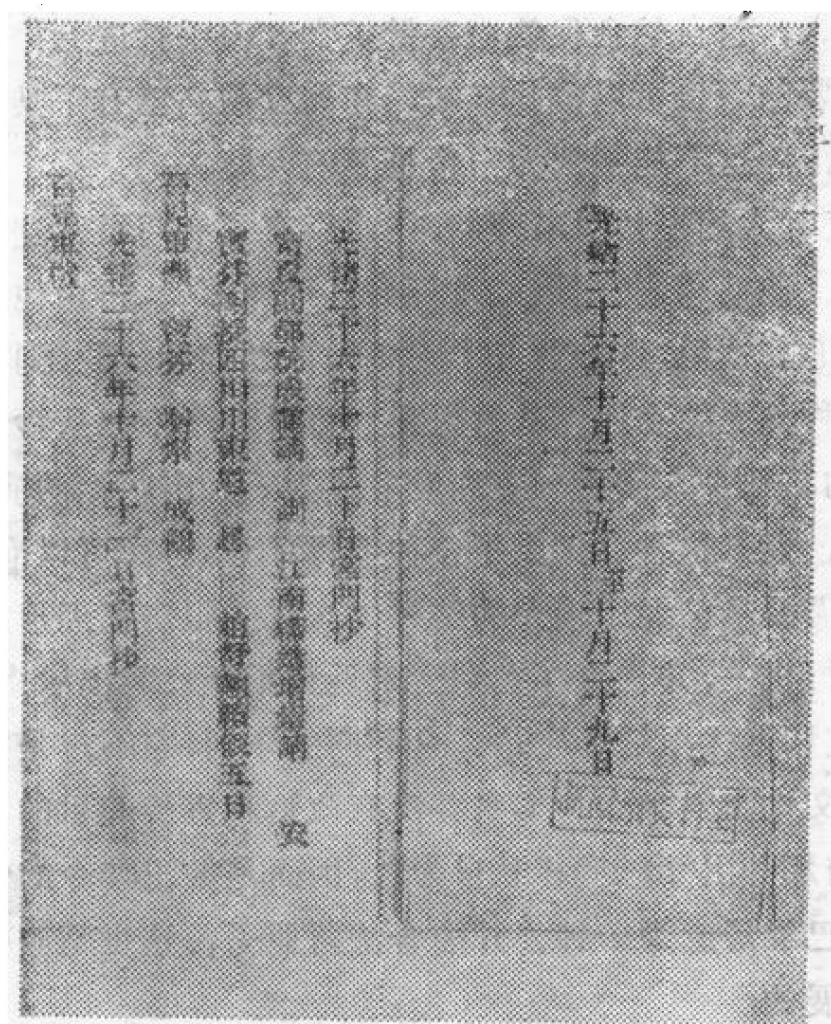
首先是采用了印刷术。据顾亭林《与公肃甥书》中说：“忆惜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印刷术的实用起于唐代，到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那时刻书已较普遍，以至很不讲究，受到学人的讥评；流传于市井的刻本小说也已渐渐普遍。但一直未用以印“报”，那应该与需要量还不大有关系。为什么到了崇祯末年却用活字板印刷了呢？是不是由于忧心国事者众使得对邸报的需要量增加了呢？这已经只能揣测了。顾亭林是极注意搜求和研读邸报的人，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他曾说：他的祖父“盖古所谓隐君子也”，却多年系统地阅读邸报，可见此时的邸报，读者已不只是高官显宦，而且也及于

^① 《论濮议》，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一。

草野学人，这自然会促使需要量扩大。由手抄进到排印是适应这种需要的。也可以由此推知，在这以前必已有了某种形式的公开发行。这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发展。

第二，大约也从明末开始，在北京有了专门经营这种报纸的“报房”。他们印刷《京报》，发行给各地的书贩，再由他们销售于全国各地。据说，这种业务本来是由南纸铺经营的，到这时终于成了一种独立的企业。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推知从抄录“条报于外”的材料供人阅读一直到发展成为一种出版物的演变过程。到这时，发行这种“报”成了一种值得单独经营、可以渔利的事。这更是需要量已经比较大的结果。这样的报房已经形成为某种出版发行机关，并一直存在到清末近代报纸已经出版多年以后。不过，它和近代报纸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过是抄印当时的官方文件材料赚钱，本身并没有政治和宣传的目的。尽管如此，它与那种由“邸吏辈”私自为之，因而是触犯禁令的情况大不相同，已经形成为一种公开的合法营业了，这也是应视为一种重要发展的。

最重要的还是内容上的变化。这种《京报》，清代的印本还有实物，它包括“宫门钞”、“上谕”和“奏摺”等栏，多的有十几页，成了一本小册子。封面即以《京报》为题，完全具有出版物的形态，发行也经常化了。发表的材料虽然基本上不超出官方文件的范围，性质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但内容是大大增加了，这就提高了它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价值。顾亭林出于一个重视读邸报的世家，自幼他的祖父就教导他“士当求实学”。而求得实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读邸报。他是遵行这种家学传统的，读邸报是他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全谢山述亭林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时，就指出了“公移邸抄”在他的研究中的作用。这自然是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的学术思想所决定的，但当时的邸报较多地



京报及其内页刊载的《官门抄》

抄发了内外官员的章奏，从而较多地记录了各时期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件和材料，有了这种客观条件，才引起了学人的重视，促成了这种治学方法的形成。邸报的这种特征又使顾亭林十分强调它在修史中的作用。他曾发现天启崇祯间的邸报与“后来刻本记载之书殊不相同”，因此认为“今之修史者，大抵当以邸报为主，两造异同之论一切存之，无轻于涂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可见，邸报由于随时发布，虽然只限于抄发文件材料，却比较详实，难于作伪，积存起来之后，反而更近于信史，不象后出的《实录》等的经过删削。这也可以说明这

种古代报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某种形态的古代报纸，推原溯始，可以说已存在了一千年以上。千余年间，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过重要发展。这是和西方社会很不相同的。在那里，人们把凯撒时代的某种公告牌式的东西称作“每日纪闻报”，那其实有些牵强。大约直到中世纪末，资本主义已经萌发滋长时，这才出现了近代报纸的前身。为什么同是封建社会，中国很早就有了古代报纸，而西方却在很长时期中并没有呢？这显然和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统一的大帝国，而西方封建时代却是小国林立，几乎连形式上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这种不同的特点分不开。我国古代报纸基本上是为维护这种封建大帝国而存在的，它们并不能直接发展成近代报刊，这是由客观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办报人的观念也受这种条件左右。这种报纸的读者基本上是封建政府的官员和准备入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岩穴之士”，那也是一些关心经世致用之学的人，读邸报、治实学，也还是为“用世”作准备，归根到底也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那时的农民实际上是“农奴”，他们决不会读邸报，邸报也不是为他们办的。在这里，报纸的阶级性一目了然。这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报纸很不相同，是连那种表面上的超阶级性也没有的。

关于这种报纸的性质问题，有一点很值得商榷。戈公振先生著的《中国报学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不过他把“邸报”算成是“官报”，列入“官报独占时期”，却并不符合事实。所谓“邸报”，当它是指的“邸”给地方长官送去的报告、情报时，那虽然确实是官方材料，却并不能算是一种出版物。至于那把朝廷“条报于外”的文件等抄出来供人阅读的材料，虽然可以说是某种“手抄报纸”，然而它又已并不是官方出版物的。

了。无论是哪种情况，说“邸报”是“官报”都并不确切。清代《京报》是这种古代报纸的比较发展了的形态，但那却是民间出版的，“报房”不仅不是官方机关，而且地位很卑下，以至近代报刊出现后仍有一个时期社会上习惯地鄙视办报人。晚清时，英法等国在和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都曾提出过某些条件，要清政府“宣示于邸报”，显然把“邸报”、《京报》当作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政府机关报看待。当时正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熟悉中国情况的赫德曾向这些西方人士说明：《京报》不过是私商的出版物，并不是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公报。尽管如此，直到本世纪初还发生过各国使馆要清政府在《京报》上公布镇压义和团的文告的事。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用近代西方的观念附会中国的事实，硬要把“邸报”当成官报，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是不该有这样的误会的。

同样，把宋代的“小报”当成是某种“民间报纸”，也只能说是根据个别记载作出的推论，是否恰当很值得讨论。明清两朝，连续出版过几百年的《京报》，报房非止一家，那倒确实是民间的出版物。然而历史上虽有过传抄伪稿或夹入某些新闻性材料的个别事例，却并无一家《京报》发展成独立地进行新闻报道的“民间报纸”。更不必说发生社会舆论作用了。看来，在严重的封建统治下，那是不大可能的。

把“官报”和“民报”说成在我国古已有之，这种观点始自清末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就立足在这种议论上。那时的维新志士要办民间报纸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提出这种观点是要为这种实践活动制造理论根据。这在当时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这种观念的产生显然受了西方文化的启发，又附会以中国古代的某些说法，不过是希望使封建统治乐于接受而减少阻力，这正是改良派政治性格的反映。梁启超虽然看到

了“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之前，然历数百年却未一推广”这种事实，但是并未能对此作出解释。继续用这种观念来分析古代报纸的历史，就更难于说明历史的本质了。事实是：正象中国的封建政权机构不会自然地民主化一样，适应封建大帝国需要的《京报》也不会自行发展成近代的民主主义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是自有其独特的历史的。

第二节 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

从古代的“邸报”到清朝的《京报》，其发展是缓慢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能发展起来，那种适应封建大帝国需要的古代报纸就不可能发展成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一批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进行宗教宣传的出版物。

当封建主义的清帝国逐渐走着下坡路时，西方资本主义却正在迅猛地发展着。十九世纪初，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远东，它一面极力加强鸦片贸易，掠取资金，一面也千方百计找寻商品市场，扩大殖民活动。传教是他们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办报刊则是传教士们的基本宣传手段之一。1815年（嘉庆二十年），最早一批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亚的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①它自称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实际上并非全不进行政治宣传。它发行于东南亚华侨荟集之区，也极力企图通过华侨输入中国。出版至1821年（道光元年），共七卷。那时，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这种宗教宣传。稍后，允许创办供在华外人阅读的外文报纸。

^① 英文名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译名显然是不确切的。

1827年(道光七年)在广州出版了英国鸦片商人马地臣办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被当成最早在我国出版的外文报刊。① 1835年(道光十五年),又有英国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自由派商人办了《广州报》(Canton Press)。但对出版中文报刊仍悬为厉禁。自然,殖民主义者是不会甘心的。继《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之后,自1823至1826年(道光三至六年)在巴达维亚②出版《特选撮要》。③ 1828至1829年(道光八至九年)又在马六甲发行《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1833年(道光十三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④起初在广州出版,随即迁往新加坡,出至1838年。这些都是由传教士办的中文刊物。它们出版于环绕着中国南部的各殖民地城市,以华侨为主要发行对象,目的都是要经过华侨把宗教和政治宣传渗入我国,并俟机把这种报刊办到中国内地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并且一度打开了在中国境内创办报刊的大门。这些活动的目的和性质十分清楚,人们不难从这里听到殖民主义者日益迫近的脚步声。

早期宗教报刊包含一些宣传西方文化的内容,客观上并不是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是,无论传教士们个人带着何等虔诚的动机,这类宗教报刊的出版实质上是与物质上的鸦片贸易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力图打开中国的大门。在这个意义上说,拒之门外未必就是不对的。应该受到谴责的是清王朝不仅不鼓励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却以为只要对一切外来事物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就可以对内维护封建统治。

① 1822年在清政府权力达不到的澳门出版过葡文的《蜜蜂华报》,如果说在我国领土上出版的外文报刊,最早的应是这一种。

② 即现在的印尼首都雅加达。

③ 英文名 Monthly Magazine,直译为“月报”。

④ 英文名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直译是“东西方月刊”。

这种顽固的误国政策是十分有害的。统治者中的开明分子对近代报刊这种新事物的态度稍微有些不同。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在他的幕僚、有进步思想的魏源主持下,组织翻译外报,借以了解敌情。那时,由于清政府禁烟政策大大加强,原在广州的外报迁往澳门。魏源选译在澳门出版的《广州报》等报刊所载有关中外关系的材料,辑为《澳门月报》,提供了解对外人的观点和态度的材料,为执行禁烟政策之助,也介绍有关外国的情况,重要的部分还曾经上报朝廷。这可说是以后出版“译报”的先声。后来,林则徐把这些材料编成《四洲志》一书。魏源为了研究世界局势而编写《海国图志》,也多采用外文报刊上的材料。他们并不懂得要办报和进行宣传斗争,但对外来事物不采取一概摒弃的态度,并利用外国报刊研究“夷情”,这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算难得的了。以后改良派通过阅读外报学习资本主义文化,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趋向的。

腐朽的封建统治不可能阻止殖民主义入侵。由于抗战派遭到妥协派的打击,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外报也随之一步一步地向国内发展了过来。南京条约使香港成了殖民主义侵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宁波等地又因“五口通商”而被打开了门户。于是,原来在东南亚各地对中国进行工作的宗教团体纷纷向这些地方迁来。在马来亚的英华书院迁到香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后,传教士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从此,外国传教士和商人首先在这些地方创办外文报纸,原来由广州迁往澳门的《广州纪事报》等英文报刊立地迁香港出版。接着,1845年在香港创办《德臣报》(China Mail),1850年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以后,随着印刷条件的逐渐发展,又纷纷创办汉文报刊。在香港,1853年(咸

丰三年)出版了月刊《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约到1856年停刊。1854年在宁波出版了《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 先是半月刊, 后改月刊, 出版到1860年。1857年在上海出版了月刊《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这些刊物都不限于进行宗教宣传, 也发表时事新闻以及宣传科学知识的材料。这样, 外国人办的对华宣传报刊由海外而沿海、由华南而华东, 终于进入了中国的大门。香港和上海就成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报刊宣传的两个主要根据地, 摆下了外报发展初期的基本阵势。

这种由西方人士创办的报刊和封建中国的《京报》性质是不同的。它们打入古老的中国之后造成了什么影响? 那时, 封建统治者对这种报刊是排斥的, 传教士们也把重点放在对中下层的传教活动上。不过早在这种报刊还在海外出版时, 每逢广东省科举考试, 便由传教人员带到考棚去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散发。可见, 这一类宗教宣传也企图影响中国的“士”、也就是未来的“官”的。但是封建统治阶级除一部分开明人士愿意阅读外报以便了解“夷情”之外, 绝大多数人对它却一概不予理睬。1851年(咸丰元年)张芾奏请刊刻邸报, 发交各省, 遭到严厉的申斥, 认为是“识见错谬, 不知政体”。这表明就是要把封建性的《京报》改为官营, 变成某种带官报性质的出版物, 他们也是不肯的, 更不必说仿效外报创办新式的报刊了。因为在他们看来, “所有刊发抄报, 乃民间私设报房, 转相递送, 与内阁衙门无涉”。他们考虑的只是政府行文的体制, 根本没有仿效外人出版近代报刊以加强宣传的观念。因此, 早期外报在我国的影响主要只能发生在民间。

外国人要在中国创办报刊, 就少不了中国人的帮助。第一家汉文刊物《察世俗》就是在马里逊和它的实际主编人米怜找到